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项目（EIA150422）：效率视野下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研究

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研究

李小娃◎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政策体现为自上而下高考制度安排，是高职教育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21世纪初，部分民办高职院校开始探索“自主招生”，到2006年教育部开始在部分高职院校试点“单独招生”，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最显著变化是高职教育规模由急速扩张向平稳增长过渡，一批国家主导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始出现。由此，高职院校也正式走上主动探索“分类发展”的道路。从已有发展经验来看，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的显性的制度性差异在于“层次”定位，并且基于这种分层产生了生源遴选的分级。制度安排通过录取批次的后置进一步凸显了社会对高职院校“低层次”甚至“低水平”的刻板印象。在高职院校探索“类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确保其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之间是类型的差别而非等级高低，成为其后续发展必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提高办学质量的同时，“入口”管理也成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所在。

长久以来，统一高考是我国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最显著特征。但是，统一高考是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阶段类型相对单一的有效制度安排。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到来及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张与院校类型分化开始促动相关教育改革。如何为不同类型高校遴选合适人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关键。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先行先试，在统一高考制度环境中，开始了自主招生探索，并逐步被推广。高职院校在自发性与路径依赖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也开启了基于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改革。2006年，单独招生考试开始在部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进行试点，由此，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各省结合国家政策，立足区省域高职教育发展实际，积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伴随着高等教

育分类发展的改革深化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也进入制度变革的活跃期，并形成了以“分类考试”主导的“职教高考”制度体系建设的新阶段。从外部来看，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属性正处于“权力”向权利的转型期，高职院校的“职业性”被重新重视。从内部来看，在内外环境综合作用下，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在“高等性”“职业性”“社会性”的多重制度逻辑中逐步形成改革的新局面。随着《国家中长期发展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定》及《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等国家及相关部委政策的出台，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相关的制度安排逐步完善，相关制度逐步从统一高考的制度体系中分离出来，进入相对独立的制度变迁新阶段。从统一高考到分类考试，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虽然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逐步进入了“分类考试”政策安排的独立推进期，但是当前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依然受国家政策主导，各地方政府虽然着力推动分类考试改革，但主要是基于考试新形式的探索，企业参与考试招生的程度比较低，高职院校在考试招生改革中通常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等问题比较凸显，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尚不健全。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创新的瓶颈。如何实质性地破解这些瓶颈性问题？我们既需要有前瞻性的创新性实践探索，同时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公平与效率是历次高考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归依。在高等教育机会供需结构开始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公平与效率的实践内容与重心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但是，“公平作为高考制度的基本价值原则”是考试招生制度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是其作为一项实践社会公平的教育制度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并非一味强调公平，用过度的平等主义约束一切改革。如何用公平的改革提升效率实践，构建基于公平底线的有效率的考试招生制度？这或许是当前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需要破解的关键

理论命题。在经济学的相关论述中，公平和效率并非对立概念，而是相互依存。因此，本研究在结合公平与效率的理论论述，立足高考改革实践，提出了“走向公平的效率”，以尝试为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可能。它是以更有效率的改革实现更高质量的公平，二者表现为互为依存的双螺旋关系。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具备了以效率改革推进公平目标的实践基础，也逐步明确了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命题。综合来看，改革需要解决的命题包括，考试招生制度的选择性，回应生源多元化与院校类属特征的动力机制，兼顾学校主体与企业主体的主体参与机制，配合权力下放与权力的监督监管机制，“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考试内容的设计以及对“省级统筹机制”的完善。尤其是随着国家“职教高考”制度安排诉求的不断高涨，建立适应不同生源类型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为高职院校多元选才、科学选才，选择符合高职教育培养要求的人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不仅需要从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供给端推进院校转型，建设一批应用型大学，升格一批本科高职，增设一批高职本科专业，也要加强需求端疏导，继续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实施中学分流，扩大生源类型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继续深入推进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实解决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如推进考试招生立法、深化分类考试基础上的分类管理、企业参与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强招生宣传及理论研究等。

总之，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逐步建立，既是高职教育发展转型的必然产物，也是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必经阶段。但是，任何一项系统性的制度变迁并非一蹴而就的产物，其变迁过程必然经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与均衡的适应性调适过程。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从国家到地方的“调适过程”的时间，但是学校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微观层面的利益均衡的实现依然需要较长时间来实现。如在部分高职院校普通高中生源依然相对充足的背景下，扩大中职生源，改

变普通高考主导地位，推广多元招生评价，对这部分高职院校来说具有较大的制度交易成本。诸如此类现实问题依然比较多，但是，统一高考到分类考试、多元评价并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体系的制度变迁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既符合高职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 录

绪 论	00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001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004
三、主要研究方法	010
第一章 主要支撑理论和概念界定	012
一、主要支撑理论	012
二、关键概念界定	016
第二章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时代背景	022
一、生源供给端的新变化	022
二、院校需求端的新变化	027
三、面临的阶段性新主题	030
第三章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制度变迁逻辑	033
一、基于高等性的改革动力： 高等教育发展转型与高职教育类型凸显	033
二、基于职业性的制度完善：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的逐步成型	037
三、基于社会性的价值选择：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逻辑的理论生成	042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实践探索	049
一、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落实现状	049
二、部分省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政策安排的实践	053

三、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特点	061
四、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实施面临的现实问题	064
第五章 国外高职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070
一、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	070
二、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考试招生	075
第六章 效率视野下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路径建构	079
一、理论依据：探索高考公平与效率的新均衡	079
二、实践路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趋势	085
三、改革要点：改革需要解决的若干基本命题	111
第七章 以效率导向推进职教高考制度改革	118
一、改革建议	118
二、展望	121
参考文献	123
附：国家及各省级人民政府出台的考试招生政策中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规定	129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恢复高考40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以下简称“高考”）在不断的改革与争议中日趋完善。统一高考制度逐步向统一高考为主导，自主招生逐步深化，高职分类考试走向职教高考的多元考试评价制度体系转变。尤其是2010年教育部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未来十年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总体思路与战略方向，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进入了“全局谋划、重点突破、系统变革”的新时代。其中关于高考制度的改革举措与思路也逐步打破了统一高考制度体系的平衡状态，推动高考制度向“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复合型考试招生制度体系的方向转向。其中，与高职院校直接相关的分类考试成为本次高考改革的亮点之一，也是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随着分类考试制度安排的完善，高职院校招生考试制度也成为国家政策安排及改革实践探索的重点领域。《规划纲要》提出，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逐步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普通高等学校普通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之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规范，对高职教育考试招生的生源类型变化、招生方式及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局性的系统设计，通过分类考试、多元评价，凸显高职

院校的“类型”特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上海市等省市，也开始在国家制度框架内探索符合区域高职教育发展诉求的考试招生模式，如综合评价录取、提前招生、注册入学、技能高考等。不可否认，在政策安排与实践探索的进程中，高职院校的分类考试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并开始呈现出国家“分类考试”政策主导，地方“自主招考”实践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但是，高考制度的任何一次变迁都是在公平及效率的“纪律”范畴内推进的。只不过，由于高等职业院校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责任与使命的差异，以及高考制度的时代特征的一般性要求，使得公平与效率之间呈现出的一种动态的相对均衡状态。在历次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均衡状态下，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改革的内容要点应该是什么？改革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诉求如何满足、是否存在参与缺位？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从历次高考改革的经验来看，公平是高考改革中的永恒命题，也是高考制度设计所关注的核心命题。但公平与效率的博弈将在不同背景下的高考改革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诚如刘海峰教授所言，“高考是有许多缺点，但现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如果我们已到了可以公开忍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来追求效率的时候，便可以减少对考试分数的依赖。如果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公平就还是高考改革中的首要考虑因素。目前高考的主体部分也还是首重公平，而将来高考改革的发展趋势，则是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①。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是对公平的固守，还是对效率的突破？不可否认，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也是在坚守公平性与实现效率性的博弈中进行改革探索。但是，随着高职院校类型属性的凸显，我国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结构现实及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等诸多时代命题的出现，效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前高考改革隐喻的核心命

^① 刘海峰. 高考改革：公平为首还是效率优先[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5): 2.

题。但是，在公平为底线的高考制度变迁语境中，如何保障效率目标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将是当前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面临的重大理论命题。当前，“职教高考”已经被明确地提出，并且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作为区别于普通本科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一类考试招生制度，职教高考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的取舍是否也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能否为“职教高考”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指导？这些都是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亟待解决的一些基本命题。本研究通过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研究，探索基于效率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理论可能、实践支撑及可能实现路径。

（二）研究意义

当前，分类考试是我国考试招生制度变迁中的又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它不仅在实践层面为高职院校提供了专门的考试招生制度框架，而且在理论层面提供了考试招生改革的理论拓展与转向。本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索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改革趋势与可能路径，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第一，拓展考试招生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从已有的考试招生研究来看，公平和效率是历次改革不可避免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公平是历次考试招生改革的核心，是“显性”标志，任何有违公平的制度安排或改革后效，通常会成为理论界与舆论的中心话题；效率通常被作为考试招生改革的初衷，是“隐性”目标，通常以具体改革实践的形式体现。公平的核心地位与效率的附属身份贯穿改革始终。但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效率也是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的手段。因此，本研究尝试在“分类考试”的制度变革框架中，探索支撑本次改革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模式，并提出“走向效率的公平”并不是对公平的否定，而是在更高层次上保障考试招生制度的公平。

第二，为分类考试招生改革提供政策参考。总体来看，分类考试相关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改革实践，也就造成地方及院校落实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缺少规范性制度依据。分类考试制度虽然对分类考试的内容、形式、管理与组织等问题都给出了指导意见,但对于改革中涉及到的权责利分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等方面,并没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本研究通过对考试招生制度变迁、高职教育发展及环境变化,提供分类考试的合理性、必然性及可行性,结合高职院校的组织特性,形成分类考试改革的可能路径,为分类考试政策的实施及完善提供可能的政策参考。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具有后发内生性特征。在高职院校产生初期,其并没有独立的考试招生模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看做一个“新概念”。这是从其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来说的。因此,以“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为主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但是,我国高职院校“生源危机”的根源在于高职毕业生社会升迁歧视、阶层向上流动的阻隔以及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①考试招生制度是此问题出现的掣肘。当前,研究越来越关注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制度设计这一命题,并从理论依据、招生形式、考试安排、录取模式及考试管理、境外经验等方面进行比较广泛的研究与探索。

(一) 考试招生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合理性需要相关理论支撑。根据筛选理论,高考作为本科入学的唯一途径,对人才市场的运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该理论指导下,高考改革应当赋予所有考生公平竞争的机会,实现“精准选拔”的核心功能从而有利于本科教育“精准培养人力资本”。伯恩斯坦的教育符码理论有助于解析高考改革现实矛盾的根源。作为一种潜藏于教育实践形态背后的调控机制,教育符码对高考政策的实行发挥着“黑箱”作

^① 田建荣.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制度设计与推进策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 20.

用,制约着高考改革科学性与公平性的实现。新一轮高考改革在提升科学性方面,体现出强调综合性、选择性与过程性评价的特征,其符码的变迁呈现出弱化分类与架构的趋势。然而,在强分类—强架构的学校场域中,教师和学生往往会沿袭他们惯用的辨识规则和实现规则,对改革方案作出强分类—强架构的解读,甚至为了应对改革而采取相应对策,使原有分类和架构变得更强。^①基于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得出了我国高考政策之所以从“国家行为”到国家、高校与考生利益互动发展是基于相关者可以从新制度中获取更多的收益;但是这个变迁过程主要是高校与政府长期利益博弈的过程,冲突的双方在博弈中重塑了新的政策,促使了高考政策中各方利益达到“纳什均衡”;同时,文化认同是高考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高考政策变迁受制于社会的整体环境与结构,高考政策的变迁不能脱离人才培养这个基本逻辑,并往往体现出和旧政策具有某种关联性。^②

(二)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政策研究

政策安排是影响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核心要素,政策研究也是研究热点之一。有研究者从政策变迁的历程视角进行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高职教育相关政策文献的梳理,提出了高职教育考试招生经历了专科教育考试恢复、高职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探索阶段、调整阶段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发展阶段。通过政策文献梳理发现,考试招生依附于统一高考,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偏少,考试内容理论化,不重视技能测试,招考机制不分离,缺乏专业性等问题。^③此外,不同类型招生政策也是研究的关注点之一。戴成林从政策工具类型视角对我国高职招生政策文本进行分

^① 杨惠雯.高考改革现实矛盾解析:论教育符码的“黑箱”作用[J].全球教育展望,2016,(3):100.

^② 李峻.基于新制度主义的高考政策变迁分析资助招生考试模式[J].江苏高教,2010,(2):101.

^③ 袁潇、高松.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9,(1):76.

析,并对不同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读,提出了丰富政策工具,合理调整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改革策略。黄文伟借用政策分析工具,对高职院校招生政策变迁及单独招生政策的制定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戴成林等基于对口招生实践的新变化,针对对口招生政策的新进展,梳理了政策的变革背景、政策内容、政策执行及社会反响。佛朝辉对高职单独招生政策进行调研,认为当前我国单独招生政策的影响不断扩大,分层选拔的政策目标初步达成,系统化选拔录取模式基本形成,但依然存在考试成本高等问题。另外,杨卫军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对高职招生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并提出政府审慎推行制度改革,高职院校尽快适应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三) 针对不同类型招生考试形式研究

对不同类型招生方式发生的必然性、组织与管理(质量保障)、对生源学习能力影响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如自主招生、单独招生等等。针对自主招生改革的发生,郑若玲等人通过分析我国高职教育招生考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提出了“无论从历史发展抑或现实状况来看,自主招生都是高职招生发展适合的方向”;针对自主招生的管理,高飞、王寿斌、谭斌等在自主招生考试的组织与管理方面,提出了改进自主招生考试组织方式与宣传策略的相关建议;丁建红通过现状调查总结了当前高职自主招生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自主招生对生源学习质量的影响,杜庆通过对自主招生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实证研究,得出自主招生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训实习、郊区生源与市区生源、不同专业之间都存在差异;但是,也有研究者对自主招生考试持反对意见,如王证之以2011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实践面的扩大为切入点,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现阶段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条件并不成熟”的观点。针对单独招生的发生,杨旭辉从高中毕业生分流、高职生源困境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诉求三个方面探讨了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的发生的原因,并总结了其终结性录取等特征;针对单独招生的组织管理,徐原等人从选择灵活评价方式和具有高职特色的评价内

容等方面对单独招生综合评价体系进行研究探索；黄斌则从单独招生考试的逻辑起点、内涵目的角度，提出建设有别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招生制度。针对单独招生对生源学习质量的影响，刁瑜对单独招生类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研究。

（四）分类考试改革研究

本研究所关注的分类考试的文献主要是2010年以来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相关研究。分类考试的实践探索早于其正式制度安排。有研究者认为，分类考试实现了从分层到分类的转变。本科与高职高专之间学历层次上的差异将真正转化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办学类型上的差异。纵向层面的分层分类考试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最终转化为横向分类考试的概念。^①关于分类考试的历史定位，田建荣教授提出，我国高职教育招生考试大体经历了学校单独招生、多元化招生、高考统一招生、高考分类考试等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我国高考制度由国家本位、政策本位向社会本位、人本立场的转变（田建荣，2017）。关于分类考试的实质，有研究者提出，分类考试反映了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新动向——效率导向，呼应了高职教育的发展规律、政府规制及社会认知的诉求（李小娃，2017）。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高考分类考试改革对于形成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并行发展提供了契机（李勇，2013）；关于分类考试的理论依据，有研究者提出，分类考试改革的理论基础包括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理论（王伟宜、罗立祝）、多元智能理论等；关于分类考试面临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当前分类考试改革面临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技能型高考宣传力度不够、人才与高校评价机制不成熟、高中阶段学生缺乏职业规划教育及普高生尚未开设职业技能课程等”（吴薇，2017）问题；关于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推进策略，有研究者提出了“统一入学考试，规范高职院校招生行为；考试与招生分离，高职院校自主选择合适生源；计划管

^① 边新灿. 高考“分类考试”改革研究[J]. 教育评论, 2017, (1): 7.

理弹性，严格控制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生均拨款差异化，鼓励高职院校办出特色”^①等等。总之，关于分类考试制度安排，研究者基本肯定了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提出了继续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相关意见与建议。此外，也有研究针对现代学徒制等新招生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如现代学徒制自主招生考试改革中，针对中职生、普通高中学生、企业员工、社会人员四种生源，考试模式可归结为两种：以考察语言应用能力、逻辑判断、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形式为“综合文化考试+面试”；以考察专业技能基础知识、职业技能为主的专业技能模式，形式为“专业技能理论基础+专业技能实践+面试”。普通高中生、社会人员可选择理论模式，中职生及企业员工可选择专业技能模式。^②针对技能考试，有研究者认为，技能考试作为选拔技术技能预备人才的工具有效性不足。主要问题在于，招生对象普遍缺乏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导致技能考试无法进行有效考核。^③

随着“职教高考”概念的提出，职教高考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命题。职教高考是与高职院校百万扩招政策紧密相关的。有研究者以“生源危机和百万扩招”为背景，提出了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现实价值逻辑可以化解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的供需矛盾、克服扩招生源压力与生源危机的主客矛盾、消除晋升需求与封闭办学内外矛盾。当前，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面临着自主招生与招生自主相冲突、“文化+技能”与“技能+文化”相互矛盾以及传统生源与非传统生源相差异等现实困境。因此，百万扩招背景下的职教高考制度建构需要、建立职教高考统一考核机制，合理制定“文化+技能”考核比例，实施分层教学、考核、培养、管理，从而建立起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现代职教高考制度。^④诚然，职教高考只是在特定背景下被提出来的，但是从考试招生制度变迁历程来看，是制度变迁

① 罗立祝. 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思考[J]. 中国高等教育, 2013, (20): 50.

② 王伟明. 基于不同生源的现代学徒制自主招生模式探索[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 (13): 103.

③ 郭静.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及改进[J]. 高教探索, 2016, (9): 108.

④ 刘芳. 百万扩招下的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 (31).

过程的必然产物，并不因为“百万扩招”政策而呈现出差异性。建立以技能基础为主要依据的职教高考体系，成以“技能高考”为主体，以职业适应性测试—高考和推荐—测试制为辅的高职招生体系。^①孙善学从“把握职教高考的类型性、包容性、开放性、适应性、自主性、标准化等特点”，提出了“中高职直升通道、高职专转本通道、普通高考通道、自主考试招生通道、成人入学专门通道、自主择校报考通道”考试招生入学模式。^②

（五）国外高职教育招生考试研究

由于我国高职院校类型的特殊性，国外没有与之完全相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国际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中，鄂甜探讨了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高职院校招生制度的基本特点：第一是多元性，招生考试制度设计上采用多元的招生生源和升学渠道，多元的考核标准与评价方式。第二是自主性，高职院校拥有高度的招生入学自主权，能够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制定本校、本专业的招生标准。第三是综合性，强调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重视学生在高中阶段的综合学业成绩与行为表现。第四是职业性，招生考试制度突出职业性特点。

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相关研究主题的分布呈现出集中性的鲜明特征，集中分布于招生方式改革方面，对不同招生方式存在的问题、改进策略及生源学习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基本勾勒出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制度路径及实践方向。但是，作为高考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依然不能回避公平与效率的博弈。已有研究已经对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中存在的区域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如何保障高考的“效率”，尚未直接在当前研究中呈现出来。这里的效率是指综合各方面因素，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刘海峰，2011）。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推进及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深

^① 刘晓 陈乐斌.百万扩招背景下的高职招生制度改革：现实诉求与改革路径[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19, (5): 1-7.

^② 孙善学.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 2020, (3): 97-98.

人，高考改革越来越多关注招生考试的效率问题。综合政策趋势与实践探索，效率性逐渐成为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安排的显性特征。因此，在坚守公平的基本价值原则基础之上，如何尽可能提高考试招生制度效率，为高职院校遴选合适的人才，应是当前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研究亟须关注的问题。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象具有双重性，包括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改革，因此，在确定研究方法时，本研究需要兼顾这两个方面的主题。为保证研究过程的科学、合理，本研究以“理论研究—实践改革成效—政策规范”作为确定研究计划安排的主线。基于此研究计划安排，本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已有相关文献是本研究的基础。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并整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研究文献、政策文本及改革实践素材。通过文献搜集与整理，形成文献综述，梳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研究现状，明晰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演变历程，了解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高职院校层面的影响。

（二）访谈调查法

访谈调查法是访谈员根据调查的需要，以口头形式，向被访者提出有关问题，通过被访者的答复来收集客观事实材料。访谈法主要是对考试研究专家与学者，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机构管理者、行业企业代表及考生进行关于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问题的相关访谈，了解处于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认识，以及对未来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趋势的研判。